

虎文化源流摭识

仲富兰

神威浩荡的原始神虎，道观寺院里的护法神兽，军旅中一往无前的虎士之慨，民间生气勃勃的虎文化元素……千百年来，虎形象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中，又从多方面滋养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品格，逐渐形成一种虎文化，焕发出一股英雄气。



布老虎
清宫旧藏



春秋·虎形
青铜饰件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虎是勇敢和活力的象征，所谓生龙活虎、龙腾虎跃。长期以来，虎一直象征着一种力量和气魄，也一直为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故事与传说所咏叹，受到芸芸众生的敬畏。虎年新春之际，我就来与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于虎文化流变的认知，向大家请教。



西汉·铜神虎逐鬼图案印 | 西周·虎纹铸 | 西汉·四神陶瓦当之白虎

■ 远古“虎崇拜”的源头

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将虎作为崇拜对象呢？或者说，为什么虎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国汉族民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兄弟的崇拜，被誉为“百兽之王”？其文化内涵和寓意，历经时代沧桑，日臻丰富。如今，虎已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民俗文化的一个标识。

要探究崇虎意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中国境内分布的岩画内容丰富，最早出现于石器时代，距今有四万年之久。岩画是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艺术。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距今大约一万年，就已经出现一组刻绘于虎沟岩石上的“五虎图”，动静相宜，生动灵气，表达了远古先民对虎这种动物的认识，展现了先民最早的动物崇拜与图腾。

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揭示了远古先民自然崇拜与图腾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茹毛饮血、风餐露宿的洪荒时代，人类与大自然互动的能力极其微弱，“万物如刍狗”，为了活着，生存下去，远古先民只能在磨难中不断进化自己。说起来，这个过程也是复杂的，比如，偶然状况下动物留下没有吃完的猎物，也许人类就会认为是特意留给自己的，出于感恩而崇拜；更多的则是在凶恶的猛兽面前深感无能为力，出于畏惧而崇拜。《山海经·海内北经》记：“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头发，所食被发，在犬北。一曰从足。”穷奇，外貌像老虎，长有一双翅膀，喜欢吃人，更会从人的头部开始进食，是一头凶恶的异兽，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四凶之一。远古先民认识动物与自然界，不可能按照当今生物学或动物学的标准，面对大体健硕、矫健勇猛、呼啸而过的虎，先民们逐渐感受到它的强者风范、王者之气，“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成为远古先民崇拜虎的前提——既然认识到虎是一种强而有力、充满威势的可怖形象，不能驯服它，那就崇拜它。

1987年8月，考古人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处距今约六千年的古代遗址——蚌塑龙虎墓，此处墓葬群没有仰韶文化其他墓葬出土的精美陶器，但其中的蚌塑龙虎图弥足珍贵，这个信息象征着古代的“龙虎”组合。

中国传统文化里，无论道教、佛教，抑或萨满教信仰中，虎都是崇拜的对象。东汉时期佛教初入我国，佛教中的萨埵那太子本着大慈大悲的精神以身饲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与中国禅宗思想相结合，又发展为神虎——使虎听经修道，修炼从善，其中最影响的是十八罗汉伏虎说——弥勒尊者伏虎罗汉。“舍身饲虎”的精神大大丰富了中国虎文化的内涵，道家文化将龙虎结合解释为“云从龙，风从虎”，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更是强化了虎的威严，将之视为极具奇幻力量的神物。

■ 从“护法神兽”到“护佑苍生”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很多人谈“虎文化”而忽略了道家文化对于虎形象的改造与重塑。道家最早确立了“龙虎组合”，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中华文化中的“四象”，也称“四灵”。“四象”一词最早出自《易·系辞》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礼记》上明确表述这“四象”是天文星宿的代名词：“行，前朱雀（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据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象被赋予农业生计和确定时空定位的意义，由此演绎出很多神话。

原本为确立天象与星宿而存在的“四象”，被道家拿来拟人化和拟物化的改造，其中的青龙与白虎演化

成威风凛凛的守护神，就像守护佛寺山门的“哼哈二将”一样，神气得很。如今走进各种道观，山门的右边，一般都是那个白虎监兵神君。它的职能就不简单了，《抱朴子》中说：“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色皆白。”说的是虎修炼五百年才会肤色变白，因而白虎是长寿祥瑞的象征，且有禳灾祈福的神力，后来还有人说它有善恶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功能，五花八门。经过道教学说的发挥，天文星相、阴阳、五行、八卦、性命之学、炼丹等都被串接到

了一起，放在虎身上，这就大大丰富虎文化在民俗信仰中的传播力。

在民俗文化中，东方青龙象征着万物复苏，春回大地，人们把青龙认作是主喜庆，后世还衍生出“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虎的形象则逐渐从远古时代的图腾神物，开始向避邪、禳灾、定方位、祈丰收的方向发展。

与想象中的“龙”不同，虎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猛兽，道家将虎形象与龙进行捆绑，符合了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需要。君王都称为“天子”，

君王是龙，文臣武将皆为虎，虎的地位在“龙”之下。封建君王敬虎为神，祈借神威，以保社稷平安。再说，虎的勇猛与力量，能代表战斗力，壮军威，故在历史传承中大都以保护神或者战斗神的面目出现，甚至连为封建统治者培养选拔高级人才的国子监，也有个“虎闾”的别称。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军事将领的营幕称为“虎帐”“虎幄”，军中禁地称为“白虎堂”。《史记》记有“窃符救赵”的故事，发兵符节称为“虎符”“虎节”；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或“虎路”；强弩的一种称“虎蹲弩”，明朝时还将一种形体短粗的火炮称“虎蹲炮”，等等。至于以猛虎的形象装饰各种兵器 and 装具，更是不胜枚举。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政权走马灯般地更迭，社会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包括风俗和观念等等。虎形象的象征意味发生了演化和改变，其造型、形状、用途也发生相应的演变——以外表威武勇猛、内藏诡谲仙气，渐渐成为为仙人所降服的角色，甚至充当温顺坐骑。也许是出于当时的风尚，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小名叫“虎头”，因精于绘事，才绝、画绝、痴绝，时人称为“虎头三绝”。

明清之后，人们对于虎的理解与认识更为理性化；同时虎也大体发展为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与精神娱乐的取材对象。譬如终南山流传的“赵公明伏虎救苍生”的民间故事，说的就是赵公明伏黑虎，黑虎感激赵公明不杀之恩，俯首贴耳，鞍前马后，成为其忠实的坐骑和得力助手；由于赵公明调教有方，这只黑虎后来也修成了正果，它护佑苍生，帮助人们驱除瘟疫，镇宅护院，被百姓们称为“虎爷”，也成了一路神仙，可以享受人间的香火。

■ “虎文化”与民俗信仰

民族精神最能在民俗信仰中体现出来。汉代应劭作《风俗通义》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作者独到的评论令此书成为研究汉以前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风俗通义·礼典》）在崇高阴阳五行学说的汉代，经由统治者提倡、文人学者的附和，虎成了“四方神兽”之一。

唐代不仅疆域辽阔，而且是一个开放、强盛的王朝，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出一种开放进取的风气。唐代各种节日盛行不衰，上古的“娱神”逐渐向中古“娱人”的方向转变。风气转变的实质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民间生活中，虎作为“神兽”的成分在降低，而作为“瑞兽”的成分在升高。唐人生活性浪漫好奇，有漫游之风，宴饮游乐时有讲奇闻趣事之习，传奇文学兴盛，文人雅士有关虎题材的作品也是连篇累牍，故事之丰富，情节之生动，个性之鲜明，如虎女嫁人、虎男娶妻、虎化为人等等。虎的存在，常常给人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猛虎不怯敌，烈士无虚言。”（唐·李成用《猛虎行》）诗人以虎为喻的呐喊，倡扬勇敢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堂堂正正地活着，正所谓“虎死不倒威”是也。

带“虎”字的成语，有“虎啸龙吟”“虎踞龙盘”“虎跃龙骧”“龙行虎步”“龙腾虎跃”等，不胜枚举。以虎为题材的民间艺术品琳琅满目，各种有关“虎”题材的作品也是精彩纷呈。正是在这种深入人心的民俗信仰中，代代民众相信虎是镇邪、辟秽的瑞兽、吉兽，民间有在门上画虎，给小孩子穿虎头鞋、戴虎头帽、虎肚兜等习俗，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还盛行给儿童做辟邪保平安的玩具——布老虎，或者用雄黄在儿童的额头点虎王雄黄酒，希望他们健康、强壮、勇敢。

神威浩荡的原始神虎，道观寺院里的护法神兽，军旅中一往无前的虎士之慨，民间生气勃勃的虎文化元素……千百年来，虎形象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中。其正气能够驱除一切邪念、邪祟，驱除家族的种种灾祸。虎勇猛自由、蓬勃大气、威风凛凛的形象又从多方面滋养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品格，逐渐形成一种虎文化，焕发出一股英雄气，转化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巨大能量。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学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

三星堆青铜面具高鼻凸目、阔嘴大耳、陌生突兀的造型，让人浮想联翩。多年前，我曾在《三星堆文化源出中华》一文中提到，它们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的玉石青铜人面（纹），具有清晰的源流关系。最典型并形似、神似的是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玉人面，大多出自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虽然两者用材不同，大小悬殊，但都是用当时最珍稀贵重的材料制作，因此都承载着非同一般的功能。形象上，两者都有有违人类生理结构的异形超大耳朵，青铜面具耳廓内还有外向内勾的明晰的翅羽纹，而玉人面耳上是飞鸟翅羽演绎的鹿棱纹。鸟能在天空中任意飞翔，被先民视为有神秘功能，因此成为了先民们幻想升天、与上天相沟通的最好媒介与使者。显然，头顶羽冠并在耳朵上装饰翅羽或鹿棱，就是为了具有更强大的通天能力。这是先民用形式表达抽象意识的一项绝妙创造。

柱形眼，也许是笔者领域欠缺，国内可参考的资料尚未发现，国外亦罕见。不过，在顶饰羽冠的非洲原住民木质面具中，也有采用与三星堆青铜面具一致的柱形高凸眼球设计，以突显眼睛的非凡神力。这种远隔万里且时差悬殊的不谋而合，是一种意向一致的异曲同工。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另一种特别夸张的柱形眼，当时同样没有找到过它的源头或相关参考依据。最近，终于在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有一件人面纹黑陶残器，残长7厘米，鼻下及右眼残缺，左眼完整，其强烈鼓凸又宽又长的柱形眼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柱形眼简直一个模样。学者研究认为它归属距今五千多年的陕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时序上应该是三星堆青铜面具柱形眼的可能性源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中国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笔者留意到，在石峁古城墙中作为废物利用的刻纹条石上，石雕人面像有羽冠大耳且眼阔嘴的形象，与三星堆几件顶置羽冠的青铜面具形神相近，区别仅仅是材质不同，再一次证明了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奇异形象并非无本之木。小巧的玉人面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发挥功能——面具可以遮其真容，避免魔鬼找上门来祸害自己；凶相面具具有驱除厉鬼的用意，笑脸面具则有取悦上苍先祖之意。这种风俗，至今在西藏、东北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巫术及傩戏中留存，川剧中的变脸、京昆戏里的脸的谱，都应该是其子遗。一些不宜佩戴的重大型青铜、木雕人面，先民平时专门置放于神庙、社坛等场所，作祭献、膜拜、祈禳用或供祭祀时的巡游。石峁先民将其玛雅式地雕刻在大型建筑的装饰性条石上，则是中国古文化中的首见。

三星堆遗址的另一件跪坐青铜人像因其坐姿被误读为下跪，被众口一词认定为地位卑微的角色，其实大错。1998年，笔者率先将三星堆青铜跪坐人与另一件虎形器座复原成一件青铜人虎复合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殿增研究员亲手按笔者的示意图将实物纹丝缝地拼凑成功，并撰文肯定。这一发现，使这个跪坐铜人的地位得到了根本的转变，他应该是古蜀的大巫师、王或首领。以后，笔者又在哈佛张光直先生“人兽母题说”的启发下，发现它是中国唯一一件青铜人虎纹分体复合器，也是据以判定良渚“神徽”为“巫师御虎踏”纹含义的重要物证，并据其规律，拼复了妇好墓、金沙遗址等多件长期分离的玉、石人虎组合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这一世所独具的绵延了四五千年的人虎母题文化系列。然而，当笔者多年后实地参观三星堆博物馆时，发现这件文物的人、虎还是被拆开发展两室，本来已经厘清的文物面貌及意义，莫名其妙地让观众继续摸不着头脑。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当下如何。但愿三星堆大巫师已经坐上了他那威风凛凛的虎蹄，重新行使与天地神祖沟通的使命。

另外，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殷切希望学术界在三星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过程中，继续关注三星堆探坑中大多数文物是被故意毁掉后埋入，而将其识作祭祀坑。其实这种现象在墓葬中经常发现，至少良渚大墓已有发现。江苏寺墩M3有几件琮璧等明显有

三星堆的『巫师御虎蹄』及其他

张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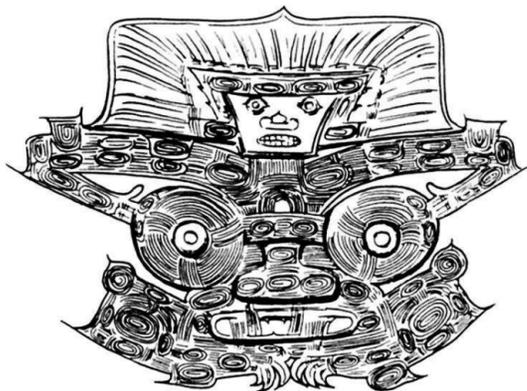
三星堆一号坑铜人、铜虎形器复位成巫师御虎蹄青铜器示意图

被故意敲碎的迹象，有的玉器甚至是分别从人骨架的头前脚后的碎片中拼接完整的。这种风习在其他年代、其他地区的墓葬中还可以找到不少实例，江浙地区直至近代还会毁物随葬。据说随葬品碎了，表示它失去了阳间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陪伴服务于逝者。笔者认为，一旦“祭祀坑”中能够找到人体遗骸，便可确定它们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历代“蜀王墓”。可惜，三星堆“祭祀坑”至今没有发现人体遗骸、遗痕。1986年的报道中提到坑中多有火烧痕迹，人体遗骸极有可能会遭到焚烧，而三千多年的风雨也令土墩墓中的遗骸消蚀殆尽。笔者早年从事田野考古，发现土墩上良渚大墓的人骨架几乎都呈粉末状，与填土色差极小，稍不留神，挖掉了也不知道。新闻报道三星堆考古当下增添了不少高科技设备，但愿我的同行们在发掘过程中能特别留意人体遗骸的残留痕迹，尤其是最不容易腐蚀的人牙，其残留的珐琅质经常是我们最后判断人骨架的有无、头向，乃至墓葬与否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各个时代的考古发现中，至今没有出现过三星堆式的纯粹掩埋大量重器的祭祀坑，即使是历代帝王级的最隆重山川海湖祭祀大典，也只是水沉、瘞藏零星的几件琮璧圭璋之类的器物。有大量贵重器物出现在坑中的，除了零星的窖藏（窖藏均不作人为毁坏），基本上都是大型墓葬，商代迨后的妇好、曾侯乙、晋侯大墓等。另外，应该注意，多个“祭祀坑”所在的三星堆与良渚大墓所在的土墩都是人工特意堆筑的，而集中掩埋良渚大墓的土墩是中国良渚制度的发端，掩埋着大量珍宝重器的多座“祭祀坑”集中于三星堆，这是不愈加清晰地指向了“蜀王墓”的角色？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

文汇报
学人
第491期



良渚反山玉琮上的羽冠神人纹线图